

東大四年的校園生活

● 楊承厚

北平校園因陋就簡

我於民國廿四年秋季考入東北大學，廿八年夏季畢業。在這四年當中，受對日關係和政局不安影響，學校本身也呈現波瀾壯闊的變化：諸如學校體制由私立大學改為國立大學；校址由北平遷至河南開封、陝西西安和四川三台；我所修的學系由政經學系改為經濟學系等乃其犖犖大者。茲就記憶所及，分四個階段析述四年校園生活的經過如次：

(一) 北平階段

在獲知錄取後，我於廿四年秋季到東北大學註冊上課。東大校長為張學良將軍，實際上校務係由秘書長王卓然（迴波）先生代理。由於在北平復校不久，校本部設於西直門裡，以法學院為主；分部設於彰儀門內，以文學院為主，學生幾乎全部為東北各省市的流亡學生；因在關內公開招生，其他省籍學生漸有增加。多數學生享受公費待遇，除學雜費外，尚免費供給膳宿；對於經濟來源斷絕或不繼的東北籍同學來說，是促使他們

能夠繼續求學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四年大學生活中，我就是受惠學生群中的一個。雖然飽受顛沛流離和生活拮据之苦，但是在節約自勵的努力下，終能堅強的渡過難關，並且有時會有怡然自得的感覺。

我所修的政經學系（後改為經濟學系）在校本部法學院上課。該址原係遜清一家王府，佔地不夠廣大，作為大學校園，只能算作因陋就簡和勉為其難而已。除了教室尚可夠用之外，其他教學設備多付缺如。例如圖書設備有限，很多同學甚至不知道圖書館在那裡。反倒因為時局不安，以致閱報室擁擠不堪。不過校本部設於北濱沿的學生宿舍，卻相當寬敞和清潔，對於同學提供優良的休憩空間；同時院中設有籃球場，也增加很多方便。

在另一方面，由於法學院長曹國卿先生主持有方，所以東大當時的課程安排和教師陣容都相當令人滿意。其時北平大學林立，教學人才薈萃，東大參考他校經驗，及利用優良兼任教師，故在課程及師資方面均可達

到適當水準，足以彌補前述設備簡陋等項缺點。可惜當時客觀環境太壞，同學很難安心讀書，只求能夠應付考試而談不上鑽研學術了。就我就讀的政經系來說，同學素質較一般為佳，向學心亦切，對於教學熱心的老師固然給予肯定和崇敬，對於缺乏授課經驗與技巧的老師，也曾請求校方中途予以解聘，事後想來也許當時過於魯莽操切。

環境日非學生恐懼

廿四年秋季入學後，我的經濟情況雖甚拮据，但並未請求家中接濟。當時物價低廉，我食宿無須負擔，每月有三、五元即可勉強夠用。我在節流之餘，並努力開源，向報章雜誌投稿，其中參加小「實報」有關中學會考問題之徵文，倖獲第一名即得獎金十元，解決了兩三個月的零用金問題。在消閒旅遊方面，有時會參加同學組織之集體觀光活動，如遊覽南口、長城、頤和園及北海公園等；週末假日多數是採取個人行動，藉以節省金錢，例如到天橋看沈三摔跤，吃油炸鬼

和炸白果；或到西單商場聽張傻子和麵包的相聲。此外到湖春吃蟹黃包、潤明樓的蒸餃和東安市場的冰糖葫蘆都是我的最愛。每日睡前如果餓了、冷了，也會到街口小店吃一碗九大枚的湯麵，痛快得滿頭出汗；今日思之，仍然懷念不已。

廿四年秋季開學後，我們雖然熱心向學，但當時政治環境日非，使我們實在無法安下心來。當時日軍增兵華北，冀察特殊化的壓力沉重，每人夜中都無法成眠。同學們無法忍受終於爆發兩次抗日示威遊行。我曾經撰寫「我的書桌擺不穩了」一稿，刊入上海出版之新文學大系之中，足以反映多數學生恐懼、不安和無奈的心情。其後復因「安內」與「攘外」政策的先後問題，引發了教育界和學生們的意見分裂；廿五年十二月西安事件的爆發和收場，加深了學生派系激烈鬥爭，造成東北大學改為國立和臨時遷校河南的結果。

茲就一年多的演變情形，分三個要點說明如下：(1)「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抗日示威：由於對日本增兵華北及壓迫冀察特殊化的極端不滿，在愛國情緒主導之下，北平市各大學學生終於廿四年十二月九日及十六日發動兩次示威遊行；其間雖與公安人員發生輕微肢體衝突，幸未釀成重大事端。東大同學因飽嚙流亡滋味，基於愛國熱忱，參加至為積極和踴躍。事後公安人員曾到校搜捕同學多人，但經學校當局奔走緩頰，不久

均獲釋。在校園充滿恐怖氣氛之中，我曾搭火車回家探親一次（盛京時報曾刊載四弟承鈞游泳不慎溺斃之新聞），其後十年一直未再回家。(2)西安事件的爆發和收場：廿五年開年後，學生組織嚴重分裂和對立的形勢日趨嚴重，東大情形更是兩極化的代表。暑假時，政校同學李君回平渡假，我招待他與我同住宿舍。有一天左派學者施存純在東大禮堂作煽動性講演，他在台上擊桌大呼「現在無人可以證明南京政府是抗日的」，我友李君氣憤填膺的高喊說「我可以給你證明」。左派分子趕來動手打人，右派及中立同學則加以護持，李君則匆匆退出會場。這個事件足以說明大家對於國是問題看法南轅北轍而互不相容。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之爆發，可以說其來有自；同月廿五日張學良將軍護送蔣委員長飛回南京，而使此次事變告一段落。由於東大校長是此次震驚世界鉅變的主角，所以東大同學在十幾天所承受的煎熬和所付出的關切，都是難以想像的。(3)學校改制與遷移：西安事變結束，教育部即擬對東大加以整頓。適新任秘書長（周鯨文先生）因政治理由開除國民黨籍學生十名，教育部除不予認可外，並於二十六年初宣布將東北大學改為國立。但因派員到北平接收時，受部分同學（多為民族解放先鋒隊及其外圍分子）阻撓而未能順利進行，乃宣布將學校遷往河南開封上課，而結束了東大在關內復校後的第一階段。

遷校開封生活艱苦

(一)河南開封階段

東大臨時遷往河南開封，約在廿六年一月間。我們參加第一批集體搬家，由北平搭津浦鐵路轉隴海鐵路而達黃河沿岸之開封。到開封後即搬入河南大學暫住；因無宿舍，乃在該校大禮堂中搭鋪暫住。上課係利用河大教室，並可在圖書館借書和自修；讀書環境尚可勉強。用膳係在河大學生飯廳進行，過去在北平以米飯為主食，現在完全改為吃饅頭（河南人稱之為饅），也無不適之感。

我們政經系原有學生廿七人，先後到達開封者計二十二二人；以此推算，全校約有三分之二同學遵守教育部命令遷往開封。由於多數兼任教師（因在北平他校任課關係）無法到校授課，僅靠少數專任教師維持絃歌不絕的局面。學校為提高學生士氣，遂邀請國內知名學者來校作專題講演（陶希聖先生即其中之一人）。廿六年四月一日愚人節，部分學生散布喊校長由南京回校並帶來好消息，全體同學迅速在河大禮堂集合歡迎聽講，結果自然是空歡喜一場。當時同學情緒之低落和消極，才演出這種苦中作樂的鬧劇。

開封氣候大體良好，就是風沙太大。某日整天刮風，大家都抬不起頭來，宿舍的床單、飯廳的稀飯和饅頭都佈滿一層黃沙，是我們最難渡過的一天。開封地處黃河南岸，黃塵隨風滾滾而來，積沙與城牆齊高，我們

有時從城牆上踏沙走出城外，這也可算國內少見的奇觀。同學們在開封的休閒空間較狹，晚飯後多到附近之龍亭散步；週末則或到相國寺看雜耍，或到禹王台弔古。至於吃著名的黃河鯉魚或聽河南墜子則是少數資力較佳同學的享受。

東大同學在開封寄人籬下的生活是相當艱苦的，幸好這種情形在四、五個月之後就隨學院遷往西安而告一段落。

再遷西安抗戰爆發

(三) 陝西西安階段

民國廿六年四、五月間，臧校長順利的接收了設於陝西省西安市之東北大學工學院。於是借住於河南大學之文、法學院乃開始再度播遷。我們乘隴海鐵路火車經鄭州及潼關而達古都之西安。當時西安校舍已頗具規模，不但佔地廣闊，同時教室寬敞，更有廣大之體育場，所以同學都很滿意和興奮，頗有回歸自家校園的感覺。

遷校西安後不久即放暑假，同學多在寢室內自習功課或到運動場鍛鍊身體，生活漸復正常。此時接奉教育部的通知，囑本校同學集中南京軍訓，並聆聽蔣中正委員長的訓話。於是在校同學集體搭隴海鐵路經開封徐州轉搭津浦鐵路，直達下關，渡過長江後，進任中央陸軍官校校舍。軍校友人（第九期入伍生許君）及政校友人李君休閒時陪我認識南京環境，並請我在新街口老鄉親吃北方

小吃，盛情可感。當時適當廿六年「七七事變」之前，日軍謀我日急，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集各界領袖舉行談話，宣示一旦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就將抗戰到底的決心。由於軍事情況非常緊急，我們這些等待集訓和訓話的學生，在抵京的三天之後，就接到搭車返回原校的通知。三、四天後我們又回到了西安。不久「七七事變」正式爆發，八年艱苦抗戰隨之展開。

對日抗戰開始後，同學們經濟來源完全斷絕。加以抗戰初期，軍事節節失利，大家苦悶之餘，祇好在宿舍裡打橋牌，敗者買最便宜的花生請客；記得有一個多月，我的消費額祇有三、四毛錢；其寒酸情形可想而知。皮鞋破了無錢買新鞋，祇好穿軍校友人送的布靴（俗稱水襪子）走路，稍久腳底板踏地生痛，也咬牙忍受下去。廿六年秋季開學後，我因為參加校內徵文，得了五元獎學金，生活略見改善。假日和同學到大雁塔小雁塔等地遊覽，偶而也到老董家吃一碗羊肉泡饃的美味。另一方面，為發揚抗戰精神，同學們也組織了抗敵後援會，於假日下鄉宣傳，並演出抗日戲劇；當年寒假我參加了戰地工作團，從潼關附近渡過黃河，在晉南趙城洪洞一帶進行文宣工作。寒假結束，又回校上課；這次活動使我對戰地情況增加了很多瞭解和經驗。

廿七年春季開學後，時局愈趨緊張。潼關發生隔河砲戰，隴海鐵路有被切斷之虞。

日本飛機不時空襲西安，或丟炸彈或以機槍掃射。某日下午同學們課餘在操場運動，即曾遭到機槍掃射，槍彈落在我身旁數公尺之處，幸而大家並未受到傷害。在課業無法進行之情況下，為顧及學生安全起見，校方於獲得教育部核准後，乃決定將學校遷往四川省三台縣。

東大遷往川北三台，約在廿七年三、四月間。首先由西安搭火車到寶雞。當時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情況下，祇有全體女同學及重要圖書儀器由汽車載運入川。男同學則進行軍事編組，徒步經棧道前進。當時我們身背軍訓時用的步槍和四、五公斤重的背包，蹣跚的走在棧道的石子上，上中左三面都是堅硬的石壁，右面則是深不見底的山谷，腳底都磨出了泡，呼吸也不大順暢，其艱困情形非身歷其境者不能想像。我們經過幾個縣份（如廣元甯羌等）都是陝南著名的貧瘠縣份，到處是灰黯的天空，沒有新鮮的蔬菜，連雞蛋也小了一號。晚間沒有適當旅舍，祇好在野地裡搭營度過，同學們每三小時輪班值夜；望著漆黑無際的夜空，真是不寒而慄；幸好沒有土匪來襲，所以有驚無險的度過。

這樣艱苦的旅程一直延續十天左右，終於到達四川邊境古稱天險的劍閣。四川不愧為天府之國，劍閣與陝南不過一山之隔，但是景觀卻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市面人煙稠密，到處翠綠一片，新鮮菜蔬和鮮肉到處

都是，我們彷彿有走入桃花源和苦盡甘來的感覺。飽餐一頓之後，學校宣布業已雇好卡車，我們不必徒步而可搭車直駛三台了。

四川三台克難生活

（四四川三台階段）

東大約在二十七年四月間由陝西省西安市遷至四川省三台縣。承三台縣鄭縣長之協助，撥借草堂寺（為奉祀唐代大詩人杜甫先生而興建）為東北大學之校舍，與縣立高級中學為鄰。我們到達之時，學校正興建竹屋，作為教室和女生宿舍；我們男生祇好在廟堂中打地鋪而與神像共處一室了。大約半月之後，我們也搬入竹造宿舍，並有竹床可睡，及竹桌椅可用了。最初是在三台土上打地鋪，後來則有不時搖晃的竹床可睡。夜間照明不但沒有電燈，連煤油燈也沒有，只好用桐油燈。吃的是粗茶淡飯，生活刻苦質樸，過的真是抗戰時期的克難生活。

東大遷校三台不久，學期即告結束。同學奉令參加在成都舉行之大專學生暑期集中軍事訓練。三台距成都約三百華里，同學有的搭車前往，有的則結伴同行，我為節省開支，決定單獨徒步行進。腳穿一雙多耳麻鞋，身背舊毯和換洗衣褲，我就上路了。在路邊攤用餐，太陽下山住入路邊雞毛小店；第二天一早上路，飽嚼「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滋味。經過綿陽、廣漢、新都而達成都，大概算我走的最快和花錢最少了。沿

途看到當地人民因不滿徵兵徵糧而展開的抗爭活動（遊行甚至攻城）。到達成都後，就向團管區報到，住入訓練營地（中央軍校成都分校）。記得開訓那天，團主任黃杰達雲將軍拿著飯碗，向我們說，前線官兵和民衆吃不到這樣的白米飯，大家都感動得哭了。在這種感召之下，受訓同學都能淬勵奮發，吸收軍事知識和技能，充分發揮團結奮發的精神。假日則到少城公園吸些新鮮空氣，或到春熙路觀光一番。當然偶而也吃一盤蒜泥白肉、芝麻湯圓和小籠餃子；這些都是價廉物美而使我永難忘懷的美味。

專心讀書收穫豐富

民國廿七年秋季開學以迄廿八年六月間本班畢業，是我在東大讀書的最後一個學年，也是能夠安心讀書和收穫最豐富的一般日子。其時學校大致整理就緒，教授陣容頗有加強，主要圖書均經開放……構成一個相當良好的讀書和研究環境。同學也都特別努力向學，除正常上課時間外，都能利用課餘時間，加緊鑽研功課。特別晚間自習時間，大家都擠往圖書館，在汽油燈下埋頭用功。儘管時間不滿一年，但大家都覺得收穫可與過去三年相比。經濟系廿八年班共計畢業二十二人，成績頗為優良平均（多數考入金融機構和財務機關），都與最後一年加強追趕和努力拼有關。

在體育和休閒方面，因為運動場地有限

，所以很多同學都利用午休時間，到城外的涪江游泳。因為泳季很長，很多人游泳技術都練得很好。記得有一天我從東岸游到西岸，然後再游回來；粗略計算約達二千公尺，時當正午，兩岸不見人影，真是夠刺激，也夠危險。其他活動以晚飯後散步為主，有時偶而也坐一坐茶館擺一擺龍門陣。

在廿八年六月畢業之前，我因參加中央政治學院研究部徵文比賽而得了一筆稿費（大約是法幣三十元）；同時重慶朋友又替我在中國政治建設學會找到一份編輯的工作，所以我在參加畢業典禮和謝師宴之後一二天內，與一位同學包了一隻小船，沿涪江南下直駛與嘉陵江交界的戰時首都——重慶。在這三兩天的航程中，每當停船休息時，我與這位同學都躍入江中游泳，充分享受參加就業行列以前的自由和快樂。因為我們離開三台較早，對於學校不久後所發生的困擾事件（縣民為索回草堂寺而搗毀學校部分設備），我們並未看到，而對三台仍然保持和陸與美好的印象。（陶佩潛教授提供，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合訂本及中外文庫、中外叢書，請撥電話五〇八四二〇六，五〇六五三一，即可收到書刊。